

孙来斌 / 著

列宁的灌输理论 及其当代价值



STUDY ON LENIN'S
INCULCATION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列宁的灌输理论 及其当代价值

孙来斌 / 著

STUDY ON LENIN'S
INCULCATION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列宁的灌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 孙来斌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201 - 1795 - 1

I. ①列… II. ①孙… III. ①列宁主义 - 理论研究
IV. ①A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2238 号

列宁的灌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著 者 / 孙来斌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曹义恒 程 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14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795 - 1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列宁的灌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08BKS001）成果



导论 列宁灌输理论的当代视界	1
一 关于“灌输论”研究的学术扫描	2
二 关于“灌输论”研究的选题意义	14
三 关于“灌输论”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20
附录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列经典著作文本研究 (1978 ~ 2008 年)	23
第一章 列宁灌输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43
一 列宁灌输理论的思想渊源	43
二 列宁灌输理论的形成过程	58
三 列宁理论灌输的实践形式	67
四 关于灌输论的首倡者问题再探	76
第二章 列宁灌输理论的科学内涵：文本的分析	88
一 列宁灌输理论的核心内容	88
二 列宁灌输理论的思想拓展	92
三 列宁灌输理论的基本特征	132
第三章 列宁灌输理论的科学内涵：比较的视野	163
一 理论回应：驳关于“灌输论”精神实质的责难	163

2 列宁的灌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二 概念澄清：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与当代西方灌输批判理论的话语差异	176
附录一 西方灌输概念的历史嬗变及当代阐释	195
第四章 列宁灌输理论的当代境遇	206
一 列宁灌输理论遭遇的“五大考验”	206
二 列宁灌输理论遭遇的“四大矛盾”	222
附录一 当前西方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及应对	234
第五章 列宁灌输理论的当代价值	250
一 列宁灌输理论当代价值的学理支撑	250
二 列宁灌输理论当代价值的主要表现	257
三 关于否定列宁灌输理论当代价值观点的辨析	267
四 列宁灌输理论当代价值的实现路径	276
附录一 革命主体与阶级意识：《共产党宣言》的有关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313
附录二 “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阶级意识	325
主要参考文献	328
后 记	341

导论 列宁灌输理论的当代视界

在人类文化的思想传播、代际延续活动中，灌输是一种普遍的教育活动。在世界德育思想史乃至整个教育思想史上，“灌输”是一个影响深远同时又存在重大争议的概念，与“教育”“宣传”“传播”等概念存在各种交集。^①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中，“灌输论”^②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原理，自列宁在1902年3月出版的《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中对其加以系统阐发以来，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促进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动员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西方主流思想受多种因素影响，对灌输做了重新“解读”，使其逐渐演化为“教育”的对立物，并不断使其污名化。受其影响，

① 有学者考察过几种西方主要文字中与中文“灌输”对应的词语。例如，陈力丹根据考察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里的“灌输”一词约有50处，对应其中大部分的德文、英文原著，所用动词各不相同（参见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215页）。囿于语言能力和学识水平，笔者只是不完全地考察过英文中的有关表达。在英语中，可以表达“灌输”的动词有instil、inculcate、instruct、imbue、indoctrinate等，这些词的具体含义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往往包含着“教育”“栽培”“培养”“输送”等多层含义。值得指出的是，对应于中文“宣传”的英文propaganda，在现代西方政治学、传播学中往往带有贬义。

② 严格说来，列宁的灌输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灌输论”不是一回事。本书将在第一章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灌输论”经历了从思想萌芽、体系初成到丰富完善的过程。从它的思想萌芽来看，无疑可以而且应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从它的理论化、系统化的最初过程来看，考茨基在1901年前后（当时他还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它在理论上的完善、在实践中的运用及其社会影响的扩大来看，这又要归功于列宁。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由于列宁对“灌输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人们习惯于将“灌输论”与列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因此，本书在不同的语境中根据表达的需要，有时对这两种表达做了区分，有时则交替使用。

国内教育界许多人士谈“灌输”色变，唯恐避之不及。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思想理论教育的内容、主体、客体、载体等表现出新的特征。在此情况下，思想理论教育要不要灌输？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用不用灌输？“灌输论”遭遇许多现实难题和理论质疑，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因此，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灌输论”要进一步发挥作用，就必须以其当代视界去着力回应思想理论教育领域中的时代问题。

一 关于“灌输论”研究的学术扫描

西方对于一般道德教育意义上的灌输早有理论关注。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界一些学者对灌输持怀疑、否定态度。但是，其所理解的灌输与列宁所说的灌输并非一回事，他们往往从“灌输”一词的最初含义出发，将其理解为以教条式的教学内容、强制性的教学方法、盲目服从的教学目的为特征的一种非理性、反人道的教育方式。^①

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列宁学从不同侧面直接探讨了列宁灌输理论。前者的代表作有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马尔库塞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分析》，两书都论及列宁灌输理论的本质，并称其具有“教条论”或“唯意志论”色彩。后者的代表作有沃尔夫的《三个制造革命的人：传记史》、波索尼的《列宁：身不由己的革命家》，两书都论及列宁灌输理论的思想来源，但将列宁曲解为俄国民粹派的衣钵传人。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列宁学有关研究既有共性也有区别：它们都论及列宁灌输理论，都提出一些责难，这是共性；前者尽管提出责难，但总体属于学术研究范畴，而后者则意在颠覆列宁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两者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对此我们应有所区别。

^① 参见孙来斌、谢成宇《西方灌输概念的历史嬗变、当代阐释及其启示》，《新华文摘》2010年第22期。

苏联学者对列宁灌输理论普遍评价较高,其中托先科等著《共产主义教育概论》具有代表性。苏联解体以后,鲜见俄罗斯等国学者的相关著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逐渐深入,特别是我国社会转型期思想理论教育新问题的不断凸显,国内学界对列宁的“灌输论”给予了高度关注。

1986年前后,余源培的《宜将“灌输”改“充实”》,王建中、王静波的《论“灌输论”:兼与李佩龙、金重、余源培同志商榷》等,围绕“灌输论”的内涵展开论争。此后,韩向前的《灌输原理质疑》、孙喜亭的《马克思主义与德育的灌输原理》等,就“灌输论”在人们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情况下的意义展开讨论。可以说,学术界当时将这项研究推到了一个相对的高潮和较高的水平。

1998年前后,学界开始关注灌输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义,代表作有徐之顺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论灌输》、胡河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不要思想理论灌输吗?》。

近年来,随着主体性德育思想的升温,探讨重点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与西方德育思想的比较,如《建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创新》《西方灌输概念的历史嬗变、当代阐释及其启示》《“灌输”的双重视界——马克思主义“灌输论”与当代西方灌输批判理论的话语差异》。除以上论文形式的成果外,一些关于列宁主义的研究专著,以及流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专著、教材,都关注了灌输理论。^①

① 值得说明的是,拙著《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2010年修订重印,曾先后获得第五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辟专章探讨了列宁的“灌输论”,并且提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主题,是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对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问题;而作为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集中概括,“灌输论”突出地反映了这一主题。当然,由于选题、篇幅和当时的认识水平所限,该书对“灌输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明显不够。此外,笔者发表了几篇“灌输论”的研究论文,得到了学界的肯定。拙文《“灌输论”思想源流考察》在2009年被“上海交通大学学科信息服务博客——人文学科”列入“最近5年国内思想政治论文排行榜”(第24名,排名靠前的文章中有多篇作者为国家领导人和学界大家)。

总之，国内学界有关研究在内容上涵盖灌输理论的思想渊源、理论内涵、现实意义等方面，其中灌输究竟是原理、原则还是方法，一直是讨论焦点之一；关注重点逐渐由理论内涵转向现实意义；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现有成果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但是，现有研究在文本对象上主要侧重于《怎么办？》，对列宁的其他文献关注较少，文本考察的全面性有待加强；在成果形式上论文居多、专著鲜见（2017年3月28日，课题组以“灌输”为篇名搜索路径，在中国知网搜到1396篇；以“灌输论”为篇名搜索路径，在中国知网搜到136篇。其中，近十年相关研究论文篇数参见表0-1），研究的系统性有待加强。此外，在关于列宁灌输理论当代价值的生成根据及实现路径的深度研究，关于列宁灌输理论与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比较研究，关于西方列宁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思想的跟踪研究等方面，也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表 0-1 以“灌输”“灌输论”为篇名搜索路径

单位：篇

篇名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灌输”	45	63	75	77	80	77	75	85	72	70
“灌输论”	7	9	9	6	10	10	5	9	5	7

自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中系统阐发“灌输论”以来，“灌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思想宣传和理论教育的理论基础，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在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影响、实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灌输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遇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引发了许多学术争论。系统地梳理这些争论，实事求是地做一些澄清，对于推进“灌输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①

① 孙来斌、申海龙：《评“灌输论”的学术争论》，《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1期。

1. 关于“灌输论”的精神实质问题

“灌输论”的精神实质到底是什么？换言之，其所强调的“从外面灌输”，到底是原则还是方法？这一问题，不仅直接关涉对“灌输论”基本内涵的理解，而且关涉对“灌输论”理论价值的判断。因此，学界近年来围绕这一问题争论颇多。

(1) “方法说”。该说认为，“灌输”是一种方法，即理论“灌输法”或理论学习法，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的主要方法。“灌输”教育法是理论教育的主要途径，是由革命导师创立、为无产阶级政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证明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① 有研究者指出，“理论灌输”是宣传和教育工作的常用方法，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②

(2) “原则说”。该说认为，“灌输”是思想理论教育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一种具体方法。“灌输”相对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和任务的实现而言，它体现为一种原则、一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遵循的法则和标准，因而应属于原则范畴。^③ “‘灌输论’是一种政治教育的理念与原则。”^④ “灌输”从根本上说是属于原则的范畴，其本质是思想理论的系统教育和宣传。如果把“灌输”视为方法，就会对实施科学的“灌输”带来各种负面的影响。^⑤

(3) “原则—方法说”。该说认为，“灌输”既是原则，又是方法。对“灌输”可以做两种解读，可以理解为教育方法，也可以理解为开展教育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灌输’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教育方针意义上

① 刘世保：《重新认识理论灌输的科学性》，《理论探索》2003年第6期。

② 刘卫星：《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存在的问题及增强其有效性的思考》，《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7期。

③ 吴君：《关于“灌输”的本质定位和实践走向的思考》，《探索》2000年第2期。

④ 彭斌：《“灌输论”的现代价值》，《理论界》2006年第2期。

⑤ 钟艺华：《新时期对灌输教育的再认识》，《当代教育论坛》（学科教育研究）2008年第2期。

的，与其相对的概念是‘自发产生’；一种是教育方法意义上的，与其相对的概念是‘循循善诱’。”^①只把“灌输”看成原则或方法，都是片面的，应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来理解。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来看，“灌输”是原则。同时，相对于自我教育、寓教于乐等方法来说，“灌输”又是一种方法。^②

在以上观点中，我们倾向于第三种，但认为需要做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在我们看来，“灌输论”的精神实质在于阐明实现革命理论与群众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传播的一般规律。它既包含阐发灌输的意义从而确立灌输原则即为什么要灌输的问题，也包含灌输之方法即怎样灌输的问题。“灌输”的意义问题，是“灌输论”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探讨“灌输”方法的前提。就列宁而言，他是在批判“自发论”的错误，阐述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传播的一般规律及其对工人运动的意义的过程中，回答这个问题的。而“灌输”的方法问题则是对意义问题的逻辑延伸，不回答“怎样灌输”的问题，“要灌输”必将成为空洞的口号。在列宁的《怎么办？》《青年团的任务》等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有很多关于“怎样灌输”的论述。

“方法也就是工具，是在主体方面的某个手段，主体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相联系。”^③从一般意义上而言，作为原则或方法的“灌输”，都是联系理论教育主体与客体的工具，很难被截然分开。在一定意义上，原则就是方法，即方法之方法，而方法则是原则的具体化。如果从方法层面来理解“灌输论”，那么“灌输”并非单指某种具体的思想理论教育方法，它包括并可以表现为一系列具体方法，如讲授法、谈话法、讨论法等。既然“灌输论”强调的是工人阶级政党将社会主义理论“从外面灌输给工人”，那么与“灌输”相对应的就是工人的“自我教育”。在这种意

① 黎元江、于幼军：《从〈社会主义四百年〉说起》，《红旗》1986年第24期。

② 陈岸然：《对政治教育“灌输”问题的再思考》，《军队政工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③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第189页。

义上可以说,在理论教育的方法系统当中除自我教育以外,其余的都可以成为理论灌输的方法。

2. 关于“灌输”是否具有强制性的问题

“灌输论”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思想阵地,注重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那么在实施过程之中,“灌输”是否具有强制性?近年来,学界对此问题也进行了较多探讨。

(1) 强调“灌输”的强制性。归结起来,其依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任何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教育必然具有强制性。统治阶级都十分重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力图把自己的政治思想、价值理念“灌输”给社会成员,并使之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共同信念和价值取向。就当前我国而言,“我们必须重申灌输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灌输的强制性。灌输确有其不可否认的强制性,它的特点就是‘灌’。没有这种强制性的灌输,就不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坚定不移地突出主旋律”。^①其二,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教育离不开强制性。无可否认,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中,政治认同、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仰的危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执政党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控制力提出了挑战。因此,对广大群众进行“灌输”教育不但具有强制性更具有紧迫性。其三,一定的强制“灌输”是应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路径。西方敌对势力竭力放大其社会制度、政治学说和价值观念,企图动摇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信念和信心。有鉴于此,坚持并强化马克思主义灌输就显得尤为迫切、尤为重要。其四,一定的强制“灌输”符合教育发展和心理认知的规律。认知心理学认为,个体在道德发展过程早期,需要基本的道德知识的积累。^②在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确立之时,对其进行必要的社会行为规范、社会价值取向教育

① 胡河宁:《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及其现实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② 罗佳:《道德灌输的改良》,《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是必要的,其中必定蕴含着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强制性。从教育学角度来看,“‘灌输’是一个从外部灌注、植入式的过程,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力量。这种外在性在教育实践中往往表现为强制性。外在性是强制性的前提,强制性是外在性的体现”。^①

(2) 强调“灌输”的非强制性。该说不同意前述强制性观点,认为:“赋予社会主义灌输教育以强制性,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② 归结起来,其理由如下:其一,所谓“灌输”具有强制性的观点,存在对经典作家文本的曲解。列宁强调“从外面灌输”,不是说要从工人的头脑外面对其“生灌硬输”,而是说要超越工人自身认识条件和狭隘社会分工的局限性,把社会主义意识“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③ 所谓强制性的观点,实际上将“灌输”理解为“填鸭式”教育,理解为“生灌硬输”,忽视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不符合经典作家的原意。其二,所谓“灌输”具有强制性的观点,存在对西方教育思想的误解。事实上,道德灌输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不能将“灌输”等同于强制灌输,当前西方德育界更侧重于“柔性灌输”,提倡非强制性“灌输”。其三,所谓“灌输”具有强制性的观点,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灌输论”和一般强制灌输思想的本质区别。中外历史上都存在倡导强制灌输的思想流派,它们站在少数统治阶级立场上,要求民众机械、被动、盲目地接受其思想观点,目的在于维护剥削制度及其伦理秩序;马克思主义“灌输论”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希望工人阶级积极、主动地思考,目的在于启发他们的革命意识,实现社会解放。可见,“‘强制灌输’才等同于西方教育界所批判的‘inculcate’或‘indoctrinate’”。^④

① 孟志中:《不同语境下“灌输”的含义与属性》,《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年第11期。

② 李义民:《试论社会主义灌输教育的非强制性及其现实意义》,《理论月刊》2002年第12期。

③ 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76页。

④ 李菲:《重释“灌输”的内涵及实质》,《教师教育研究》2004年第1期。

在我们看来,上述两种说法,看似相互矛盾,实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的特点,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加以理解。“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① 统治阶级将自己的思想作为统治社会的精神力量,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我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成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公有制主体地位和人民当家作主政权性质的体现。从这个必须遵循的原则上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无疑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世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依靠科学理论的魅力吸引人,依靠严谨的逻辑征服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开创“灌输论”思想源头时,就一再告诫革命者不要将理论生“灌”硬“输”给人们。“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② 列宁在论及青年的理论教育时明确提出要反对“简单生硬地把政治灌输给尚未准备好接受政治的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③ 他在讲到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灌输时,提醒全党:“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而只能靠榜样的力量,靠农民群众对日常实际生活的认识。”^④ 可见,从具体的宣传手段和教育方法来讲,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又无疑具有非强制性。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是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体现了“灌输”的原则性与方法性的辩证统一,归根到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的辩证统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50页。

②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7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62页。

③ 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者教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422页。

④ 列宁:《全俄工兵农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265页。

3. 关于西方德育界对“灌输”的态度问题

众所周知，在西方教育学界特别是德育学界的话语体系中，灌输与反灌输是近年来的一大热门话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发展，我国学者对此也给予了关注，并因此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解读倾向。

(1) “否定说”。该说认为，灌输式教育曾经是西方最有影响的教育方式之一，后来经历了从怀疑、批判到否定的发展过程。西方最早明确对灌输式教育进行怀疑和批判的是16世纪法国思想家蒙田，18世纪卢梭随之进行了更猛烈的批判，19世纪英国教育家斯宾塞又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特点角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20世纪以来，以美国教育家杜威等人为代表，西方教育学界彻底否定了以非理性、强制性等为特征的灌输式教育。在20世纪，西方教育领域的最大变化就在于其“对灌输式教育的彻底否定”。^①可以说，西方“近代以来对‘灌输’的界定基本都是呈现负面性或者负面倾向的，也就是说，‘灌输’和‘道德灌输’成了教育学界鞭挞的对象”^②，“灌输”被视为“极权、专横的代名词”。^③有学者进一步引申指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低效应的原因就在于“灌输”，就在于对其过分迷信和依赖，走出当前的德育困境的出路是应用“无灌输道德教育”。^④

(2) “主线说”。该说将“灌输”视为西方德育思想发展的主线，认为尽管西方教育学界对“灌输”的态度前后有过变化，但“灌输”教育一直是西方德育常用的手段，从来没有被完全否定和抛弃过。有学者指出：“西方学校道德教育经历了从古代的强制道德教育模式到近代的理性主义道德教育模式再到现代社会的科学化、人性化道德教育模式，因

① 郭法奇：《灌输式教育：从怀疑、批判到否定——20世纪西方教育的最大变化》，《比较教育研究》2004年第11期。

② 蔡连玉：《道德灌输：两种不同视角的审视》，《中国教育学刊》2008年第1期。

③ 王凡：《东西方道德教育灌输法与价值澄清法之比较》，《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④ 刘惠：《走出困境：“无灌输道德教育”及其现实意义》，《教育探索》2005年第4期。

此,我们认为,灌输是西方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形式。”^①
“纵观西方道德教育史,从古代、近代坚持和注重道德灌输,到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的批判灌输,再到20世纪末重新探寻灌输的新形式和新方法,西方道德教育可谓一波三折,又从终点回到终点。”^②

根据以上我国学界两种不同的观点,结合对西方教育思想史特别是德育思想史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以下几点。其一,西方教育学对“灌输”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对此必须做系统的历史考察,不能笼而统之。以古希腊的“种子说”和古罗马的“蜡印说”为代表,西方古代道德教育的灌输特征无疑是非常明显的。西方近代虽有卢梭等人对道德灌输提出诸多质疑,但也有夸美纽斯的“印刷说”、洛克的“白板说”提倡灌输。可以说,灌输在西方近代道德教育中仍居主导地位。至于批判和反对灌输的倾向,则只是在西方现代教育学中才成为主流。其二,西方现代教育学界对“灌输”的认识也非铁板一块,对此必须做辩证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毫无疑问,杜威的实用主义、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以及柯尔伯格的道德推理法等,无不以反对灌输为宗旨,占据西方现代教育学的主流。但是,这种一味反对道德灌输的思潮在实践中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道德危机。这种现象,早已引起了当代西方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推动他们去重新认识并肯定灌输的道德教育功能。其中,美国教育界权威人士托马斯·里克纳、政治学家梅里亚姆等人也都对此做过深刻阐述。^③其三,西方德育话语体系中的“灌输”与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灌输”存在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西方德育话语体系中的“灌输”有其特定内涵,特指以教条式的教学内容、强制性的教学方法、盲目服从的教学目的为特征的一种非理性、反人道的教育方式。毫无疑

① 杨新宇:《西方学校道德教育的灌输特征及启示》,《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4年第1期。

② 刘梅:《西方“道德灌输批判”的意义及启示》,《理论探讨》2000年第5期。

③ 陈华洲:《西方社会道德教育中的灌输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6期。